

谈杨绛致费孝通的一封信(下)

□董凤宝

——这就是费孝通所说的阿古什透露了他与杨绛、钱锺书的关系。也仅此一句而已。

但从杨绛后来跟吴学昭谈话所说“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”看,费孝通爱杨绛是事实,但杨绛并不爱费孝通。

《杨绛散文》《钱锺书散文》二书的书名,都是杨绛题写的;《费孝通散文》的书名,如果也由杨绛题签,在费孝通看来,无疑就是确认、留存了相关历史信息,或者就是“证得”了情缘吧。

费孝通的这种心理,杨绛应是看出来。所以在信里,杨绛说,最明智的做法是你自己题写书名,你要是非用我的题签不可,那也随便你,反正,我也给你写了。

杨绛的心理,也是很有意味的。她显然是不想引起公众误会,不想再给自己增添“困扰”,所以不主张费孝通用她的题签。但杨绛如果态度坚决,完全可以不题书名,可她又毛笔、硬笔都写了,还写了很多遍。“对于你要做的事,我一概没有反对”,这是说,对费孝通做的很多事,自己可能不认可,但也没有反对。是哪些事呢?想来可能是特指与钱、杨有关的谈话或写作,也包括这次题签的要求吧。

费孝通接到杨绛的短信后,第二天对张冠生说:“当年我和杨季康好过,后来她不跟我好,我并不介意,也没有对钱先生不好。我对她一直很好,推荐她搞‘毛选’的英文翻译就是一个例子。这可以说明我对人宽宏大量。杨先生在这个事上超脱不出来,还纠缠在里边。这对她的心情和健康不利。但我们也不能勉强。女人有女人的想法。我们是男人,让一让,听她们的就是了。”(见《书生去》138页)

对此,费孝通不无怅然甚至委屈,但还是尊重杨绛意见,自己题写书名,没有使用杨绛的题签。杨绛已经很难了,不给杨绛再添困扰,费孝通此举值得所有读者敬重。我们也是从这个谈话知道,钱锺书进入英译“毛选”班子的原委。

但费孝通不知道的是,在自己亡故之后近10年的2014年,在《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》里,杨绛于“1932年”条下,写道:“2月28日晚抵北京,有我们旧时东吴学友转学燕京的费君来车站,接我们一行五人到燕京大学东门外一饭馆吃完饭,然后踏冰走过未名湖,分别住进男女生宿舍。”

这里的“费君”,就是费孝通。在“大事记”里,一个可有可无的细节,留了下来,那该是杨绛对青少年时期同学情意的极大尊重和珍重,费孝通九泉之下有知,或可释然。

附带还可一提的是,若杨绛在世,张冠生在书里录用杨绛致费孝通此信,想是得不到许可的。1990年代,“钱”学研究者范旭仑、李洪岩等,编辑纪念、评论钱锺书的文集,被杨绛投诉,结果是赔款若干,并公开道歉。其主要原因在于,这两本书,未经钱、杨二人同意,使用了钱、杨书信。

钱、杨二人对来往书信中的隐私内容,极为看重。2013年“钱锺书书信手稿拍卖案”,以及杨绛生前销毁很多私人来往信件和日记,均可视作对个人隐私的保护。从这个角度说,张冠生在《书生去》中使用杨绛未公开发表的致费孝通信,是一种冒险的行为。

1943年4月10日,陶亢德与“神交”多年的周作人在苏州站相见。据其《陶庵回想录》忆述,“我得讯已在他到苏州的隔日,与友人柳君(即柳雨生)匆匆赶夜车赴苏,到时已午夜”,次日赴苏州站,得见周作人下车来。既然得讯已落人后,何以到站反在人前?“隔日”或为记误,但此中的曲折亦非始料所及。

4月8日,陶亢德接周作人函,谈及不日南来,相约“至宁一谈”,故陶亢德“打听从上海到南京的行旅究竟劳民伤财到什么地步”,知往返票价才“四百余”“乃决定10日搭夜车赴宁”。4月9

日,“下午7点余钟”,柳雨生告诉陶亢德,纪果庵自南京来电报说“知翁9日赴苏”,于是两人“急匆匆赶往车站而去”,到苏州后“城门是关了”,所幸致电“又道知堂并没有到”,始知为纪果庵所误。原来这位“纪大胖子”,因寒病与痔疾并作,“在床上草一电稿发出,改约海上诸友请往苏一会,忆其日期似云知翁10日抵苏,不知何以弄成9字,遂害得陶柳两兄,在苏州城外大受洋罪”。当时“夜深天寒”,挨到凌晨三点左右,“陶柳两兄”才在旅馆得一空房借宿,“不免骂胖子错打电报”。

4月10日,赴站接车,午后“车子进站了,到底雨生眼快,已瞧到了苦雨斋与闲步庵(即沈启无),奔上前去”,并由柳雨生作介绍,“在人声嘈杂的车站上”,陶亢德听周作人说“嘎嘎,亢德亢德”(陶亢德《知堂小记》)。而沈启无则对陶亢德说“胖子肥医生疮,在床上喊痛”。后来,纪果庵有诗咏其事,“万人翘首望知堂,消息传来各渡江;胖子缘何行不得,支离病后起臀疮”,又说,“早知如此不如不发前电,使两公稍劳其民,微伤其财,竟到南京一行,无论如何,胖子可见”(纪果庵《知堂老人南游纪事诗》)。

陶亢德与周作人之“初见”

□ 曹善

绿茶画名家书房·谢冕

1932年生,文艺评论家。



谢冕书房 我参观过很多学者的书房,大多都是这样乱而有序。做研究和写作,非得是这样的状况不可。整洁的书房或许更适合读闲书或休息。

灯下读钱

《顾廷龙日记》中的钱锺书(十)

□钱之俊

钱锺书为合众图书馆做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捐书。统计合众图书馆历年工作报告,自1943年7月至1951年8月,钱锺书共向“合众”捐书约108种163册。日记自1944年始有记录:

1944年2月1日,“默存来阅书,并赠《苓泉年谱》。”

1944年7月5日,“默存来,赠《吴董卿集》。”

1944年9月27日,“默存来,为松师见赠所著《皖志列传稿》及《天放楼文言续》,并谓函中询及鄙况,因念睽违函文忽将十年,尺素未通,转承垂念,为之惶愧。”

1946年1月14日,“节之为默存送《周报》18、19册来。”

1946年3月30日,“默存来,赠《周报》。”

1947年,1月28日,“默存来,赠《思想与时代》。”

1947年4月17日,“默存来赠书。”

1947年9月9日,“默存来,赠远东教育会议所发物。”

按:“《吴董卿集》”有误。桑农《关于默存与合众图书馆的三条史料》(《文汇报读书周报》2009年9月25日):“书名应为《蕙里里馆诗》。著者吴用威,字董卿,是默存好友冒孝鲁的姑父,时任汪伪政府高官。该书为其子吴本钺赠送默存的,现藏上海图书馆(合众图书馆藏书后来都归入上海图书馆)。书上有题词‘默存先生,甲申闰四月本钺敬赠’,并钤‘吴本钺’三字阳文方印。”

1943年10月26日,顾廷龙“致默存函,索《念劬庐丛刻》。”《念劬庐丛刻》为无锡徐彦宽所编,系徐氏“所钞辑清贤秘帙佳著”而成,计有梁讷《评书帖》一卷、朱洪章《从戎纪略》一卷、孙毓汶《退菴集杜诗》一卷、谭献《董子定本》一卷、谭献《复堂诗续》一卷、谭献《复堂日记补录》一卷、谭献《复堂日记续录》一卷、谭献《复堂喻子书》一卷。后五种都是谭仲修(即谭献,号复堂,晚号半厂)的著作,盖因徐彦宽的姐姐嫁给了谭献的次子谭瑜(子镗),因此得尽读谭献遗书,并为之董而理之收入《丛刻》。



新书快读

王康武回忆录(上、下卷)

王康武、林娉婷著 林纹沛、夏沛然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

本书是历史学家王康武亲笔撰述的唯一的回忆录,其在年近九旬之际,回溯上下求索、“长年半游牧”的一生,回忆录兼具丰富的文学与史料价值,笔调平实深厚,谦逊动人,堪称20世纪历史洪流之中一部丰富而独特的生命画卷。

诸子与诸国:中国古代思想的起源

张经纬著 中华书局

作者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脉络作为主线,通过对东周列国主要人群迁移趋势的动态描述,重新为诸子百家的纷至沓来绘制清晰的脉络。全书突破以往将东周历史与诸子思想分开叙述的既有范式,将诸子哲思置于各国历史演进互动的背景之下,提出中国古代思想起源的全新范式,为我们理解古代中国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启发。

《资本论》轻松读

[日]的场昭弘著 王琰、张琰龙、江涛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

日本经济学教授的场昭弘,结合自己在“二战”后数十年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经验,对《资本论》进行了补充和发挥,将《资本论》与现代社会发展相结合而写出这本书,将人们对《资本论》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。

摩登大观园:当20世纪中国女性遇到媒体

游鉴明著 商务印书馆

不管是20世纪初期或中叶,还是中国大陆或中国台湾,媒体中的女性论述或对女性知识的建构穿越了时空。本书透过多元搜集的报刊史料与不同角度的言论文章,将当时大众的女性形象再现于今日的读者眼前,并借由对这些现象的探讨,使我们得以建构更完整的概念。